

古代江南生态乌托邦及其实践^{*}

□ 吴海庆

内容提要 江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孕育出了江南社会的生态乌托邦。为了将这个乌托邦变成现实,世世代代的江南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在农业时代江南文化视野中,人的生命源于自然,又最终回归自然,生命的理想在于与大自然同生共荣,如“花里神仙”般美好。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就需要营造一个能够充分获得大自然力支持的“仙境”一样的家园。当城市化和工商业开始冲击人们的桃花源之梦时,一部分人借江湖平衡来自于城市文明的压力,另一部分人则开始了建造“城市山林”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 江南 生态 乌托邦 实践

作者吴海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金华 321004)

在中国古人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天人和合的生态乌托邦。正如姚文放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乌托邦、道德乌托邦、人格乌托邦等无不通向生态乌托邦。”^①中国古人对这个生态乌托邦的追求专注、持久而强烈,并且创造了各种通向这一乌托邦的实践形式。这一现象与中国古人“以神道设教”的哲学逻辑有关,因为这一哲学逻辑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人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和相关实践活动。不过,古人关于自然的思想观念归根到底是以实体性的自然环境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我国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相关实践方式。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到作为我国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山水。东汉以后,江南山水得到适度开发,逐步成为人们理想的栖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只要因循自然,适时渔耕,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这里的人们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以江南的青山、绿水、飞禽、走兽、奇花、异木

等为基型构建了作为自己生活理想的生态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滋润和各种实践形式的锤炼,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并且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一、“花里神仙”的生命意识

在苏州留园五峰仙馆厅内仍保留着晚清状元、江南名士陆润庠书写的楹联:“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韵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这幅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楹联虽带着一点令人稍许感到压抑的清高,却也反映了过去时代江南名士内心的渴求:读诗阅文,汲取人文精华,通晓人情事理,赏梅兰,观莲菊,品海棠,汇聚自然神韵,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如“花里神仙”般美好。作者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追求,真切地融在了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7BZW008)

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把人与动植物相提并论,把人类生命享尽天年的自然归宿视为理想,乃是江南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独具特色的生态品质。江南文士喜欢以自然植物的形、色、味来赞美和解读人的品质。如自古以来,江南文士就热衷于赞美“百花之英”的兰花,把兰花奉为最为高贵的花种和君子人格的象征。屈原最爱兰花,故“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离骚》)^②。郑板桥也深爱兰花,赞美芝兰在“高山绝壁”上生存的能力,还在自己的一幅画上题诗云:“春雨春风写妙颜,幽情逸韵落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题破盆兰花图》)^③画家以兰花冲破乌盆入深山的生动意象,来象征和喻示自己在官场和尘世面前的骄傲和圣洁。对花草树木的人格化理解和敬尊之情,促使江南文士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来改善人与植物的生态关系。如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不久,就把东起同济桥(今通贯桥)、西至山塘街西山庙桥的堤塘岸接通,在河塘堤岸植桃李莲荷数千枝,并赋诗云:“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菱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武丘寺路》)^④在白居易看来,改善自然环境就是改善人类自身,因为人的生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品质;作为一个百姓的父母官,对于百姓的责任和义务就必然包括他对于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栖凰安于梧,潜鱼乐于藻”(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其一)^⑤,人要过一种自由、高贵的生活,就必须时时、处处维护自然生态和谐。

与植物相比较,动物对人的感情影响要复杂得多。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如虎、豹、熊、狼等因为在古时经常会威胁到人的安全,所以有时被视为邪恶之物。但通常情况下,那些不会危及人的安全甚至有益于人类生活的飞禽走兽、蝶鸟虫鱼则被赋予了美德、智慧和力量等,并被用以鉴照人的品行,滋养人的心智,增强人的勇气。在江南地区,由于自然界物产丰富,气候温润,动物们也是活得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少与人发生争执,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或动物造福于人的情况更为普遍,反映在审美文化中也便多了一份人对动物的喜爱和赞美。如“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范仲淹《江上渔者》)^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

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黄师塔》)^⑦等诗句中,都流露出人对江南春天里动物的形态、动作、鸣叫和感觉的真切喜爱。有些动物引人伤感,如“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棹怅望层城霞”(苏轼《仙都山鹿》)^⑧，“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⑨等诗句中的野鹿、黄鹤,虽然它们带给人以寂寞与失落,但诗人对它们表露出来的依然是一种隐秘的沟通,冥冥中的相知。有些动物还成为人们表达爱情的媒介,甚至成为爱情的直接对象。如《聊斋》中有一篇故事情节颇为奇幻的《西湖主》说洞庭湖中的猪婆龙被周绾射伤,陈明允见其可怜,为其求情,逃过一劫。后来陈明允在洞庭湖遇到风暴落水,猪婆龙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让他与西湖主结为良缘,享受两世生命的欢乐。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情爱故事,淡化和模糊了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的差异性,表达了古人对宇宙间生命共性的认同心理。

文士们的这种自然生态观念,有着深厚的江南民间文化基础。首先,绝大多数江南民众都保持着对动植物的亲和关系。如杭州方言中,橘与“吉”同音,简化后又与“桔”通用;柏谐音“百”,柿谐音“事”。于是在杭州一带便形成了一种将三者联于一体的风俗活动,即正月里“签柏枝于柿饼,以大桔承之,谓之百事大吉。”^⑩其次,江南百姓世代都持守着与动植物共生共荣的观念,并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如在浙江省郭下村,村民们视龙山树木如生命,将护树保林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老祖宗为防不肖子孙有砍林毁林行为,曾订下严格的族规遗训代代相传:“上山拾材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那些违规者除了受到肉体处罚外,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并会遭到众多子孙的唾弃。在苍坡村,李氏第九世祖李西斋,大力倡导村民植树美化家园,立下禁令,“凡在树上栓牛者,立杀牛不赦。”立下禁令后,自己以身作则,自家牛因为长工栓在柏树上而被杀^⑪。在楠溪江两岸,树木参天,森林相连,区区一棵树似乎无足轻重,但古人却不这样看。据《棠川郑氏宗谱·新宫坳樟树记》载,浙江永嘉新宫坳太阴宫有大樟树一棵,“大可丈围,高难尺计”,见利忘义之徒企图砍伐。“于是村中知事者不敢袖手旁观,斟酌再三,集款买归老宗祠之业,立有字据,永后并不许砍断”,

以致大树“绿阴匝地，翠盖遮天”^⑩。在古代江南地区，聚族以律令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律令与处罚制度的形成有些是与封建迷信有关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古人敬畏自然，持天人共生的立场，具有谋求族类永续无绝发展的远大眼光。

二、人间“仙境”的家园意识

在江南，水的灵动与浩渺，山的幽玄与神秘，为早期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足够广大的活动空间，并且诱发人们在奇思妙想中构筑起虚幻的时空，从而使巫覡文化的流行具备了坚实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据文献记载，至隋代，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仍然是“信鬼神，好淫祀”^⑪。巫风盛行为具有迷信色彩的风水观念的生根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而风水观在江南的流行，又使得江南的村落布局和房屋建筑形式带上了几分神秘的风水色彩。不过，正如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指出的那样，“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⑫风水学显著地促进了江南各种建筑和村镇布局与周边山水环境的和谐关系，人们在营造自己的居住环境时，都在自觉地努力地使之接近于风水学所追求的“仙境”。

风水学对环境的基本态度，是观照山川自然美而巧加人工裁成，这与古代士人“山水之乐”的审美情趣相为表里。而风水学更能以其娴熟细腻的实际处理技巧，使自然进到更完善的层次，这就赋予江南建筑及其整体环境以隽永的美学气质。江南文士多青睐风水，如杨万里诗云：“我住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鲜。松髻沐初净，山花插更妍。我来犹斜阳，我望忽夕烟。一望便应去，不合久凭栏。山意本自惜，如何许人看？急将白锦障，小隔青鬓颜。近翠成远淡，缥缈天外仙。谁知绝奇处，正在有无间。倾刻万姿态，可玩不可传。”（《东园醉望暮山》）^⑬诗中将风水视角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视角，把山水、风水与生活凝炼为一种极美的意境。从地理常识与生活经验上也可以看出，诗中所描写的那种相对封闭的地形特征十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背山可以屏蔽冬日北来寒流，面水可以接纳夏日南来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

日照，近水可以拥有方便的水运交通和生活、灌溉用水，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灾，茂盛的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整小气候，果林或经济林还可取得经济效益和部分的燃料能源。就其综合条件而言，是非常适宜于人们安居乐业的。在古人的生活实践与生产实践中，他们一直在寻找和开启伟大的自然力，并努力使自己的建筑形式、生活方式等尽可能与之相协调。他们相信，只有与大自然心心相印，获得大自然力的支持，才能有人的生命与生活的丰富与和谐。因此，像郭璞、谢灵运、苏东坡、杨万里等众多文人雅士，对“莲花地”、“四灵地”、“龙凤地”等良好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都充满了敬畏、热爱与向往之情，不惜苦心运思，遍寻佳句来咏赞其言说不尽的魅力。

太极与八卦图代表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空间意识。在村落布局上，江南丘陵地区可以利用山、水、平原交错变化的特点充分体现这种空间概念，使自然山水最大限度地为人服务。一般的村落也都尽可能按太极图来布局，这样既符合传统的空间理论，也简单易行。如浙江武义县的郭洞村，村名因其地理态势“山环如郭，幽邃如洞”而得，颇具仙韵，村庄结构也由一条龙溪左盘右绕，将郭上和郭下两个村子勾勒成一幅龙腾虎跃的太极图。郭洞人何寿之称郭洞“山不深而饶竹木之富，水不大而尽烟云之态”^⑭，生动地描绘了郭洞村的山水萦绕之姿。在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人们会在太极基础上设计出八卦布局。如位于浙江中西部兰溪市境内的诸葛八卦村即按九宫八卦设计布局，整个村落以钟池为中心，钟池由水陆两条阴阳鱼构成，两个水井代表两个鱼眼。在这个微型太极格局外，八条小巷向四周辐射，形成内八卦，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构成外八卦。其中的民居多为“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建筑风格，给人素朴、典雅的感觉，而那些无论大小都修葺整齐的水塘，则让人领略到一种水乡风情。

中国风水学不仅将整个大地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且在局部地区也努力将各种生态和生命活动现象纳入到区域性的生态系统中。对某些在形局或格局上不太完备的地理环境，风水学则主张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来使其达到改善，如通过引水聚财、植树补基、建塔“镇煞”或“兴文运”等来改善

一个村落的结构。不可否认,由于狭隘功利主义和迷信等因素较多,风水学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它的直接目标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荒唐可笑的关系,但风水学由于能够全方位综合地去规划环境,所以一般来说它在客观上能造成以人补天的效果,从而提高了环境的生态平衡能力。如江苏《同里镇志》中说:“此洲当湖之口,砥柱中流,一方之文运系焉。虑为风涛冲激渐至沦没,乃倡议捐金累石筑基,环以外堤,植以榆柳,创建圣祠以为之镇压。”^⑩将一个水中小洲视为一方文运之本显然是荒谬的,但建堤植树以固洲,使区域性的自然生态更加稳定,这无疑有益于环境的综合品质。

总的来看,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总体条件使人们更有可能按照风水学的要求去建造如仙境般美好的家园。而风水学抛开其迷信的伪科学的成分不说,单就其追求的生态效应而言,的确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风水学主张人类创造性地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明确地肯定人类美化环境的能力,并强调每一个人对保护环境、维护环境生态平衡所负的重要责任,这对于人类持久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欲把一麾江海去”的志向与建设“城市山林”的设想

江南城市文明从春秋时期开始崛起,到中唐以后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城市建设的规模、数量,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教育的水平,都开始高于北方,宋廷南迁后尤为显著,宋人李心传称“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⑪江南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矛盾最早暴露出来,并引发了士人对文化生态的深入思考和广泛关注。

一部分士人对繁荣发展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做出了理性的肯定,认为工商业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消费同时带动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如王阳明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节庵方公墓表》)^⑫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说法,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层面上肯定了商贾的地位,与贱视商贾的思

想相比表现出更多文化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则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计财三》)^⑬这是对王阳明“四业同道”说的发挥,也是明朝后期商贾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后在思想文化上得到的进一步认同。同时,针对世人的“奸商”偏见,也有不少文人为商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如清人沈垚云:“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不少文艺作品及行状、寿序、墓表、祭文中看到有情有义、勤俭创业、慷慨好施、诚信不欺等正面的商人形象。

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商业发达的城市,金钱和财富的魔力越来越大,它足以使人忘恩负义、鲜廉寡耻、践踏伦理纲常,甚至导致整个封建文化生态的失衡。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孙枝蔚《过仪真县有感》)^⑮的现象。巨商富贾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又行贿揽权,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于一向以“安贫乐道”标榜自我的士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于是一部分士人以封建伦理价值和名节观为依据,展开了对拜金思潮的抵抗与批判。如清代士人董含云:“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货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趾高气扬,傲然自得。”^⑯像董含这样对商贾新贵们的“趾高气扬,傲然自得”持否定和蔑视态度的人并非少数。他们虽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重商风气,但对于抑制社会腐败,纯化社会风俗,维护文化生态的平衡,是有重要作用的。

面对日益强势的城市工商业文明,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士超越于本末、道德和利弊的争执,以人的天性、自由、兴趣等为旗帜,来对抗城市的喧嚣

和压抑,捍卫心灵与文化的和谐。苏东坡诗云:“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蟋蟀语春秋。”(《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之二)^④在苏东坡看来,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知道也不理解江湖中的清幽与宁静,而城市对习惯于江湖生活的人而言简直就是牢笼。苏东坡以为,自己本性是属于江湖的,所以提醒自己不要留恋城市中的“公卿故旧”,而应该像陶渊明那样坚定地走向江湖,去享受自由的人生。事实上,从魏晋以后,把江湖与城市对立的并不只是少数失意文人的偏激思想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一种连绵不断的文人思潮。孟浩然云:“敝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即事贻皎上人》)^⑤在这个布衣诗人眼中,城市是喧嚣污浊的,只有清明澄净、富饶美丽的江湖才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其它如张九龄、杜牧、李流芳、文震亨、袁宏道等,都有“欲把一麾江海去”(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⑥的江湖之志。可以看出,随着江南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江南文人心中的江湖情反而越结越深。

江湖逐渐成为古代江南文士获得心理平衡的巨大的调解器,然而,由江湖文化塑造出来的江湖实际上只不过是江南文人心中一个乌托邦而已。因为与城市一刀两断并不符合文人修文的初衷,也不符合社会对文人群体的基本要求。因此更多的情况下江南文士是在谋求一种城市和江湖之间的妥协与平衡。如白居易提出的“中隐”^⑦思想,即“既不永绝宦情,又通过对文人生活情趣的全力发掘与精致加工,来强化自身存在的意义。”^⑧“中隐”说穿了,就是使个体生活环境克服城市与江湖各自的弊端而兼具二者的优势,可以在城市与江湖之间进退自如,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的快乐与自由。明代文人顾汧则明确地提出了创建“城市山林”的思想,即在喧闹的城市中营造一种幽静的、远俗的、山水相依的生活环境。像扬州的“双桐书屋”、苏州的定树园、杭州西湖等就是“城市山林”的不同形式,它们既有城市的便利,又有山水之乐趣。明代文学家高启在谈到苏州狮子林时说:“至者皆栖迟忘归,如在岩谷,不知去尘境之密迩也。”(《狮子林十二咏序》)^⑨狮子林能够给人的那种“如在岩谷”的江湖幻觉,其实正是文人们营建城市山林的初衷。

不可否认,不管是白居易的“中隐”之梦还是顾汧的“城市山林”设想,都带有浓郁的乌托邦性质。但是也必须承认,它们都是古人寻求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和谐积极成果,是今天的人们建设自己的家园和文化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与古人相近的关于和谐生存的现实问题。钱穆先生在《城市与乡村》^⑩一文中指出,其实城市和乡村都是人生所需要的,因为人生既需要休息与安逸,也需要劳作与竞争。人们带着一身的力气和对财富、地位、事业、优越生活的向往走进城市去参与竞争,追求自己的理想;当他身心俱疲的时候则需要到乡村来休息,又带着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回归乡村和自然,这是人类的天性。而城市山林化、府第园林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的天性的这两个方面得到很好的调和。钱穆先生以朴实的语言发展了古人的思想,也触及了当今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生态、心态综合平衡的根本性问题。

注释:

①姚文放:《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思想》,曾繁仁主编:《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②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③曹惠民、李红权:《郑板桥诗文书画全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④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34页。

⑤《白居易全集》第1册,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⑥《范仲淹全集》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⑦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05页。

⑧④王文诰:《苏轼诗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337页。《仙都山鹿》诗前有一段叙,说丰都县令与山中一鹿关系甚好,此鹿“甚老,而猛曾猎人,终莫能害。将有客来游,鹿则夜鸣,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尝失。”

⑨王启兴、毛治中:《唐诗三百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页。注:如崔颢、杜甫虽非出生于江南,但都有长时期漫游江南的经历,深受江南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故将其与江南文士并列。

⑩胡朴先:《中华全国风俗志》下(下转第100页)

②参阅《南宋史研究丛书》系列成果。关于元代杭州的细部研究的著述亦不少,兹不赘举,但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仍较为薄弱。

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国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⑤[元]方回:《桐江续集》卷8《旧长三十韵寄赵宾》,卷13《后苦雨行》,《续苦雨行二首》,卷14《泊赤岸微晓》,卷24《问西湖》,卷25《人日立春记苦雨无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元]刘仁本:《羽庭集》卷3《杭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元]郑元祐:《侨吴集》卷5《杭州即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元]杨瑀:《山居新语》,《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

⑨[元]张之翰:《西岩集》卷6《送李仲芳赴临安行省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元]钟嗣成、贾仲明:《录鬼簿》卷下,巴蜀书社1996年版。

⑪隋树森:《全元散曲》上“[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页。

⑫[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盗有道》,卷28《嘲回回》,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⑬[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20《北山分脉城内胜迹》,卷12《南山城内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⑭《桐江续集》卷19《戏咏昌化县土风二首》。

⑮《侨吴集》卷5《送沈仲说游杭》。

⑯《西湖游览志》卷18《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⑰[元]舒頔:《贞素斋集》卷2《送杨子成归钱塘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⑱[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委巷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⑲《南村辍耕录》卷11《杭人遭难》。

⑳《桐江续集》卷18《五月九日甲子至月望庚午大雨水不已十首》,《十九日始晴》,《次韵受益苦雨二首》,《三月二十九夜二更杭火焚花巷寿安坊至四月一日寅卯止》。

㉑《南村辍耕录》卷9《火灾》。

㉒[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183页。

㉓[明]陈善等:《万历杭州府志》卷4《事纪下·宋元》,中华书局2005年版。

㉔[元]俞希鲁等:《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城池》,《宋元方志丛刊》本。

㉕[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10《兵防志》,《宋元方志丛刊》本。

㉖《西湖游览志》卷13《南山分脉城内胜迹》,卷14《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㉗《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

㉘《西湖游览志》卷18《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㉙《万历杭州府志》卷4《事纪下·宋元》。

㉚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206页。

责任编辑 尹之

(上接第93页)篇卷3《浙江·临安县》,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①⑥《中国古村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40、442~445页。

②关传友:《论明清时期宗谱家中植树护林的行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7卷第4辑。

③胡朴先:《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3《浙江·总志》,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④转引自一丁雨露、洪涌:《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⑤《杨万里诗文集》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0页。

⑥张竟先:《风生水起》,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卷2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5页。

⑧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28页。

⑨《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⑩沈焘:《落帆楼文集》卷24,四部丛刊本。

⑪孙枝蔚:《溉堂集》下册,《溉堂后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⑫董含:《三吴风俗十六则》,《三冈识略》卷6,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⑬佟培基:《孟浩然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⑭《杜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⑮白居易《中隐》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居易全集》第1册,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⑯赵洪宝:《古代文人与屋舍文化》,鲍世行、顾孟潮主编:《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30页。

⑰衣学领主编:《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页。

⑱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页。

责任编辑 尹之

ing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Keywords Merleau-Ponty, Structure of Behavior, Perception, Sense

**Whose Misreading and Which way is Good, “Battle between Poem and Philosophy”
Questions “What Aesthetics Goes for”?** (83)

Gong Baolo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ttle of philosophy and art needs the reconciliation of religion or aesthetic. Indeed, human is human himself who must confront life world.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life is sav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oem and philosophy is in harmony. And at this time, aesthetic is expressing the sorrow of life and soul. In the end, the notion Idea from Republic is waiting for the courage of human's spirit.

Keywords Life World, Life, Poem, Philosophy

Ancient Jiang-Nan Ecosystem Utopia and Its Fulfillment (89)

Wu Hai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conceived Jiang-Nan social ecosystem utopia. Jiang-Nan peop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ontinuously made every effort to fulfill the utopia. In the agriculture ages, Jiang-Nan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life of people came from nature and then returned to nature; the ideal of life lay in living and being together with great universe together, and was fine as “fairy in the flower”, but people should construct a “fairyland” home that could fully acquire support of great natural forces to carry out this target. Some people balanced the pressure that came from civilization in the city by nature; other people began to quest constructing “forest in the city” wh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y business started to pound at the dream of people's Shangri-La.

Keywords Jiang-Nan, Ecosystem, Utopia, Practice

Discussion on Hangzhou during the Song-Yuan Transition Period (94)

Yao Jianguo (Jiangn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in Hangzhou was a very important stage. As Hangzhou was the capital of dynast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he city is also very rich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but the documents about Hangzhou in Yuan are far less. So there are some gaps on the research of two periods. In this article, the lat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are considered as a long transition period. It describes the general picture of Hangzhou,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relative prosperity of Hangzhou in Yuan.

Keywords Southern Song, Yuan, Transition, Hangzhou, Relative Prosperity

Talented Women's Literary Network in Seventeenth-century of Jiangnan (101)

Song Qingxiu (Jiangn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There has formed a women's literature network crossing blood, family and region in 17th century of Jiangnan. They construct their own literary field. In this field, women's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ing were strengthened. The women's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eventually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showed different atmosphere and character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Keywords Talented Women, Literary Network, Literary Field

**The Popular ‘Ku Xi’ Clothing in the Period from 3rd to 9th Century and
the Culture Mixing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108)

Zhou Xiaowe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Wang J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3rd to 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mixing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is one aspect which reflects the level of culture mixing. Thus, Ku Xi, a kind of clothes which combines the feature of Northern people and the traditional custom of the central plains, is worth for observ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short life of Ku Xi, focusing on the emergency of the Northern people, the culture mixing, and the reason why Ku Xi became popular and then disappeared.

Keywords from 3rd to 9th Century, Clothing, Ku Xi, Culture Mixing